

第一章

导论：官方知识政治学

孩子和批评家

事情发生在午餐之后。孩子们在学校餐厅吃完午餐之后就到外面玩耍，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才回来。没人看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两个孩子开始怒目相向。两个人言辞激烈，相互诋毁。他们的周围围上了一圈人。其他的孩子想把两个人分开，但是不一会儿他们就打了起来（只是纠缠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向彼此挥拳）。校长此时正在外面和几个负责操场事务的教师交谈。他（此‘他’可能为‘她’，然而不是在这个情况下）上前分开了此时正在哭喊着、已经筋疲力尽的孩子。（他此时怒火中烧，到现在为止，今天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揪着孩子们的领子把他们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但是不仅包括原来的两个孩子。他指着兴奋而又焦虑地围观着的一个孩子，大叫着让这三个孩子到他的办公室去。马上！

发生在办公室的情况可不令人愉悦：九岁的孩子呜咽着、哭泣着，校长严词斥责着他们，打电话让三个孩子的父母把他们领回家并且警告他们说，这种行为不可容忍，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就会将他们停学。

孩子们的父母中有一个已是第二次被叫到学校。那孩子通常是个旁观者，但是试图去调停冲突。两个星期之前他的父母第一次被叫到学校，他们的孩子卷入了一次严重的斗殴事件中。他的父母和老师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说，打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他吸取了

教训，试图阻止其他人打架。现在他第二次又给自己惹了麻烦。

第一次是因为一个大点的孩子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嘲骂他并且最终使他忍无可忍。大点的孩子是个白人，而我们说的这个孩子是个黑人。嘲骂通常是一个词，翻来覆去地重复，这个词是“黑鬼”。别去理他，别去理他，最终还是爆发了。他是被指责的一方，然而愤怒使他无法开口为自己辩护，其他的孩子又众口一词地对“谁挑起了争斗”撒了谎。然后就发生了在操场上的另一次争斗（后来我们发现这是关于在垒球比赛中谁应该击球的事情）。这个意识到不应该打架的孩子又一次卷入了争斗。有人看到他置身其中；他最近打过架；他是个黑人；他应该和这事有点关系。

这不是个虚构的故事。这个孩子叫保罗，他是非裔美国人。他是我的儿子。

一本关于教育中不同参与力量的书以这样的方式开头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我认为有感而发的东西能够时常提醒我们那些被义正词严所批判的如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并不是抽象的。它们的负面效果是很大的。它们从未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由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塑造。

以这个例子而言，种族主义以一种微妙（也许并不是那么隐秘）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重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看起来无法和别的事例相比较。如乔纳森·卡扎尔(Jonathan Kozol)在《野蛮的不平等》(*Savage Inequalities*)中所描述的学校中的野蛮场景^①及洛杉矶今年发生的骚乱所引起的公众震惊等。（当然，我们永远要记得，对于那个团体的真正凌辱在保守主义对城市和穷人进行攻击的过程中至少已有十二年的历史，由里根政府推行并由布什政府继续的政策极具毁灭性，右翼及其联盟对于穷人的理想、梦想、机会甚至于肉体的毁灭性使得发生在洛杉矶和其他地方的街头暴力变得不值一提。）但是一个孩子——这次恰巧是我的儿子——多年来在种族主义及其力量占上风的学校的经历使得他在这个过程中几乎被摧毁。这样的事情如何发生，特别是它们如何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构成了我想在此论述的内容的一部分。这深刻地涉及到我们的教育机构采取的

和面临的知识政治。

尽管种族问题在我的论述中占到相当重要的地位，^②特别是在关于当前右翼复兴的讨论当中。然而，种族问题却不是在教育问题中形成不同的力量对比的唯一原因。性别、阶级关系、性别关系及其之间的矛盾关系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我在这里所说的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因为我将自己置身于在这个社会中如同官方政策般日益制度化的东西相对立的地位。我所宣称的批判主义和重新认识以相互联系的方式解读了教育。这与这个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状况及克服这种不平等的努力一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之上是一条道德的和政治的原则，即“不近人情的方式不应成为谋求福祉的捷径”。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每一个发生在经济、教育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举措“都会由其可能导致的与之相关的公正、分配、个人尊严、安全、自由和责任心等来进行评判”^③。这说明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追随、探询和分析的过程“将会给人类的生命带来尊严并且认清人类具有幽默感和创造性的一面”，我们不应将众人视为可操纵的对象或者解放他们的头脑去追随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训教，而是将他们作为涉及到他们所处的所有机构的一切事务的民主探讨的参加者。^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保守主义的教育议程对此毫无兴趣。我后面会讲到，它已经巧妙地转换了民主的意义，因此也就与我前段所论述的意见脱离了关系。这样，保守主义议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对于教育的不懈攻击。

导致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教师和“专业教育家”对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近乎完全的统治。这种自制权“不仅使教育体系无法对消费者（家长和社团组织）负责，而且使得自由主义思想的课程安排得到最初的发端”^⑤。

国家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家长有更多机会进行选择，可靠性和控制力的加强，教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所有的这些建议作为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许从内部而言是互相矛盾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保守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植根于整个运动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翼。^⑥被保守主义所诋毁的评判有些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和教

育上对于右翼的回应却完全是步入歧途。这不仅对于保罗这样的孩子是如此，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

例如，保守主义的复兴建立在一个脱离策略（*de-integrative strategy*）的基础之上。因此，作为这种策略的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一个“分化的和非道德的政治团体”^{9, 10}。右翼脱离了一些团体性活动，而这些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些保护和有限的财政和政治上的利益。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右翼试图剥夺那些它认为是非“主流”群体的权利（如非裔美国人、穷人、依靠社会福利的人等）。这些群体，经过多年的斗争，最近才部分地引起了国家政策的关注。这种脱离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使“妇女、少数民族、男女同性恋者、失业者和非工会组织者更加难以参加到有意义的工作当中去”。与之相伴随的是“明确地抛弃普救论和作为福利国家进行重新分配的社会思潮，不再追求国家干预之下全体就业的目标以及坚决的谋求特定团体的利益”^{9, 10}。即使在 1992 年一位更加“温和”的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右翼还是在诸如我们的内外政策、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解读自己及我们对彼此的责任义务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具毁灭性的影响。保守主义团体的力量在地方、县和州的层面上持续增长着。

在第二章中，我遵循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将之称为独裁的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然而将其称为分割的排他主义（*arithmetical particularism*）更为精确。因为它针对人群中的特定团体发出呼吁，如：基于对种族问题和正面行动问题的呼吁、企业主的观念价值、反工会思潮、标准化、基于原教旨主义宗教信条之上的神圣知识和权威以及家庭观念等。因此这不是围绕统一目标的全体动员，¹⁰而是试图将人们以不同的轨迹分割而最终将他们置于强大的右翼团体的统治之下。

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新右翼不仅认识不到他们面对的矛盾，而且也不能轻易地解决这种矛盾。对于反对他们的人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机会也同时形成了一种失落感。¹⁰在第二章我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全书范围内我也时有提及。

权势阶层经常会对一些指责我们国家缺点的人的爱国主义和良好

愿望提出质疑。他们会问：我们国家全都是糟糕的地方吗？你不能说点好的地方吗？为什么要批判我们的经济恶化？为什么要批判我们的性别、阶级和种族政策？别的国家难道不会一样糟糕或更差吗？当然，这个国家不‘都是差的’，主要是因为存在一种有力的国民传统，本质上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对我。”但是权势阶层似乎不明白的就是在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和目标被阴谋玷污的时候保持社会良知声音的重要性。他们还不能理解的是：批评，如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所言，特别是在其最强大的时候，其本身就是一种肯定。那是承诺的一种形式，是“提出主张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讲，这是公民权的终极表达形式，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它说明的是，我“不仅只是在此逗留”，我（我们）居住在此地。^①因而批评就成为表达我们不要口头承诺和破碎的梦想的最重要的方式，我们是把那些承诺当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国家官僚社会运动遭到失败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继续非常关心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体制的一举一动的的主要原因。在文化层面，资本主义建立了一种可以丈量一切的尺度，包括丈量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标准是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及我们是否成功地创造了财富。对于那些不能贡献利润的人，这种标准“自然”地导向了对他们的责难。这样也“模糊”了剥削关系，使得一部分人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得以发达。^②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每一个富人之后必然有五百个穷人。^③显然他并不是出于世俗或意识形态原因而说此话的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对于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我们的学校中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洞察，这是引导我在此书中所提问题的一种认识。

类似其他情况，我在此处的调查要求我同时考虑到学术上的发展和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状况。因此，我必须保持两个焦点：一个是理论上的探讨，另一个是切实的或潜在的政治和教育的实践和趋势。

具有批判性不单单是找毛病而已。这涉及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是如何由偶发的历史状况和对立的力量对比关系而作用形成的。^④历史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我对于保守主

义复兴的分析和对于历史的复原之中。即政府如何在过去参与了界定官方知识的过程以及它如何从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角度形成的文化和权力的相互关系上成为矛盾的焦点。

根据我后面的论述（在某一章中，我论述到我们如何将文本视作组成和重组权力关系的基地），权力不仅仅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它当然可以用来控制、以非民主的形式向人们强加某些观点和做法。然而，它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建立反映我们民主的需要和希望的机构的具体方式的存在。这特别适用于两个层面内存在的权力关系，一是“大众”的层面，一是常识的层面。正是“常识”部分使得右翼现在的所作所为成为合法，也使得会有更多的孩子遭遇我儿子的经历。

我反复地讲到常识是因为大众文化是测验我们日常生活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场所。我这样做不是完全出于学术原因的考虑，尽管这样做会很令人愉悦。（当然，有时这种愉悦只有作者才有。）这其后还有一种政治敏感性。我观察了构成理解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和右翼在重组这种权利关系时的作用。这样做一是为了表明这种构成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二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它。^⑩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借助了很多人的努力成果，他们中有的人在日常学校实践中努力体现他们的批判性视角（很多教师非常擅长此道），有的人花费宝贵的时间批判性地写下了这个社会教育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

尽管我强调了教育中批判性工作的重要性，我还是要提醒那些花费时间用来反思的人。在别处我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⑪ 但是在此重申我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的。

也许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人们可能在创建伟大理论的圣坛上丢失一种政治觉悟。被称作“具有批判性的教育研究”的一大部分变成了单纯的时髦。从一个理论到下一个理论，每一拨高雅的后现代理论（特别是法国的）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的同行者。有时这无疑必需的。例如，统治很大一部分批判性教育研究工作的传统需要被打破及重组。因为他们忽视了很多诸如性别和种族，身体和性别关系等问题。因而围绕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行为和其他方向的女性研究的增长已经产生了令人敬佩的效果。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的视角已经变成学术圈内少数人的文化资本，一些个体对于学术变动性和名望的过分关注已使他们对于发生在学校中关于文化和权力方面的政治问题漠不关心。^①对于一些人而言，小学、中学和高中几乎不存在。一切都变得如此虚无飘渺。与此同时，右翼正取得振奋人心的战果。

不要将此书解读为对于理论的苛评。我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兜售我的理论，我不想再做这个，而且也不为有这种想法感到不安。在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可以看到批判性理论工具和概念的影子。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国家和阶级关系的持续的重要性的观点^②是与一些传统紧密联系的，如源自家族和种族关系理论的分析、文化研究、语篇分析还有论述消费、认同政治学和愉悦政治学的后现代理论等（最后一点无论你是否相信与否）。^③尽管，如同你看到的，我对于后现代理论有诸多保留。我选择在文本中插入理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方法起到了作用，它们考虑到了学校、教师、课程设置和学生，而不是将自己与教育这回事分割开来。

我这样做的原因也是由于我的信念——我自己作为一个政治行为者，作为一个政治和教育行动超越了单纯的对他们进行口说笔写的人——这一点对于像我一样的人而言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批判性的工作应该以一种有机的形式来完成。它需要参与到进步主义社会运动和对现存的剥削和统治关系提出挑战的团体中去。“中立的知识阶层”的角色在这里显得有些奇怪。

我意识到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政治上这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其中就没有矛盾。对于统治关系的质疑就会产生矛盾的效果。一种重要的扩展性思维就有力地反对了对诸如“进步性的”、阶级、种族、性别等概念的简单化使用。就好像所有的有色人种、所有的妇女或所有的劳动阶层团体都是一种思维模式一样。不仅是在这些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个体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斗争。现实就像同时收听多家电台的广播，每一家有时会播放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只收听一家电台的广播。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保证，即有哪件事或哪个人是永远“进步”的。

只举一个例子，有些女教师可能对于阶级政治非常保守，支持那些可以扩展日常生活中经济影响的政策。然而，还是这些女教师，作为妇女，她们可能会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可能会伤害到她们的女学生的具性别歧视的政策和课程安排中去。如果这名教师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她可能会积极地参与到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但是她可能会认为许多女性问题都是关于那些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

对于男性教师而言，事情也是如此。有些人会致力于推动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学校如何重建新的阶级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除非阶级力量对比有所改变或者人们已经不再对于男女同性恋者怀着极大的歧视，等级关系或性别关系就不能构成“真正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人们可能同时持有“进步的”或“反进步的”立场。如同葛兰西(Gramsci)告诉我们的，在我们复杂的意识经历中都会有好的意识和坏的意识因素。知道了这一点，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全书中贯穿使用“进步主义”一词，以此来表示使我们的生活和机构民主的愿望和承诺。无论在何处使用它，我都希望读者会提问，“这里也有矛盾斗争吗？”“这些趋势是否会减损其他争取平等运动的力度？”

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作为一个警示，而是要表明批判性教育研究的立项和相关事项还只是在形成之中。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项目。我们的社会状况和推论外延都在变化——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获得报偿和未获报偿劳动分野的转变；阶级关系的变化；性别、种族和性别关系的新政治的变化；右翼对于教育的攻击等等——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也随之产生变化。同时也存在一种我们了解世界的政治。这也关系到权力和认知形式的关联问题。^③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也为思考批判性工作在教育和其他领域内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思路。“批判”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某个时代的斗争和希望的自我澄清”^{④⑤}。这实际上指明了批判性理论和政治实践相关联的三种途径。第一，“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危机斗争作为批判性理论的导向”观点的稳定。第二，它将社会运动作为矛盾斗争最重要的发端者并且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第三，这“意味着，只有在政治实践的严酷考验中，批判性理论才会经历其可行性的最终考验”^{⑥⑦}。

所有的这三项——历史的特异性、社会运动和政治（文化）实践——是贯穿全书的重要论据。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分析对于帮助我们理解性别和权力如何在社会中发生作用非常重要。她的分析也极好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她告诉我们怎样去做才能使他们的“智力工作”变得有“可行性”。

我们该如何来考虑这样的角色呢？首要的是，他们（或我们）需要是

社会团体的成员，……需要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换言之，他们应在社会中占有特定的位置，而不是在一定意识形态之外漂浮不定的个体。^②

但是,这并非全部,他们(或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正因为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他们（或我们）能够为那些社会活动作出重要的贡献。因此，

设想他们……作为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已经获得了政治上有用的职业技巧：他们具有说明福利制度是如何将贫困女性化制度化，或者说明一首诗怎样才能具有东方色彩的主题。设想他们的潜能不仅使他们可以在大学这样的专门机构运用这些技能，也可以将其利用于大的、公共性的文化和政治场合中。设想他们参与到反对文化霸权的斗争前线中去。^③

这是这样一个角色的正面作用。然而，它需要通过活跃的（广泛构思的）政治经历来得到不断的修正。因此，

设想他们，也同样遭受伟大幻象的驱使，他们也需要同他们的政治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尽管这些人并不是职业文人），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诚实的品格。^④

对我而言，这里有两点是正确的。一，认清了傲慢自大的危险性；

二，认清了批判性工作的重要性（尽管其作用是有限的）。当然，每一个涉足教育的人都可以也都经常扮演这种角色，因为没有不以理论为基础的行动。我们经常（但不总是有意识的）根据行动结果来作出决定。而且必要的是：将这些决定与有关事项结合起来。如创造具有亲和力的社区和社会正义的构想以及在一个大的运动中体现这一理念。任何一个从事于批判性工作的作者都希望她或他的读者可以很全面地理解这些关联，我在此书中也不例外。

官方知识的政治

如同我所指出的，无论在白宫中掌权的是哪一个政党，这个时代也是右翼在教育中复活的时代。教育的目的为何，什么样的和谁的知识可以被认为是合理合法，谁有权利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在保守主义复兴中得到了重组。这一些改变发生在官方政策的层面，也体现在右翼有能力说服很大一部分人去相信，即在教育内外，私有的是好的，而公有的则是不好的。这种趋势日渐表明于对于教学和课程的有力攻击；认为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即满足工业和商业的需求；在许多州内对于教学的严格控制以及教育日益成为保守主义计划的一部分等。

现在的形式清楚地显示，教育已经被深深地政治化，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证。正如我在此书前三本书中所论证的那样（《意识形态和课程》，《教育和权力》，《教师和文本》）^⑤，教育和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总是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体。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斗争的结果。他们努力使他们的知识合法化，保护或增强他们的社会活动模式以及增强他们在大的社会舞台上的力量。

然而，权力集团也不是那么强大的。官方知识的政治就是妥协和折中的政治。他们的进行一般不是强行的，而是暗示统治集团想要创造怎样的形势，那么妥协就在那一点上对其产生倾斜。这些妥协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语篇的层面上，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在学校中传授的知识的层面上，在教师和学生课堂中的日常活动的层面上，^⑥以及我们怎样理解这一切的层面上。

这一切当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妥协。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力去界定什么是需求或问题以及对此合适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什么。^③但是，这些妥协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总存在或可以创造一个可以采取更加民主行动的空间。我会在此书中努力阐明这一点。

《官方知识》一书分析了对于课程、教学 and 不同层面上政策的斗争。同时也指出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存在的机遇，而不仅仅是限制。此书论证到，学校中课程的形式、教学和评估都是妥协的产物。统治阶层为了保证他们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考虑到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这种妥协通常很脆弱，总是暂时性的并且时时面临威胁。对于反对霸权的活动而言总是会有机会的。

在第二章“常识的政治”中，我论述了右翼如何建立了一个新的霸权协定，一个新的妥协，并将不同群体的视角统一在其领导之下而形成一个围绕在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性别关系等考虑下的张力极大的联盟。保守趋势统治了关于教育的公众话语权。即使是在这样的妥协之中，也存在互相矛盾的结果，这也是我想在此书中传递的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在教育和其他领域内存在着产生更为民主的文化政治的空间。

我们也不能夸大这些“空间”。保守主义复兴的力量非常强大。它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官方知识的政治，特别是围绕课程设置的斗争。

这种现象的效果体现在构成“真正课程设置”的教科书之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如何看待文本呢？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章着重论述文本的政治，并且再一次表明，右翼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文本本身的特征——具有矛盾性和开放性的意义，许多可行的解读方式等——并不一定能够产出霸权主义希冀的知识体系。

第四章“制约官方知识”承接了上一章对于文本的考察。右翼可以施行其日益增长的力量的一种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政府机构赋予其在某些团体内传播的知识以官方合法性。关于这一点在美国最重要的就是州教科书选用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对于官方知识的斗争经常是围绕在这些选用政策和计划之上。他们是如何让保守主义形成一种控制的机制的呢？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以求在学校中获得更加进步的

文本和课程设置呢？我的论证就是，这段历史表明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斗争在过去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今天对抗右翼的日程也会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

教科书和在州的层面上的官方的国家控制不是右翼入侵学校日程的唯一方式。不断出现了更加新颖有趣、更为不同的干预方式，这些方式正在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学校的本质的观念。

商业介入的新形式和私有化是在这里起作用的重要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频道（Channel One）的快速发展。它在美国 2000 计划和众多建立大批私有的、赢利性质的学校计划形成之前就已经成型。第一频道，这个以赢利为目的、中间插播广告的新闻广播机构现在已经播及到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初高中学生。在这里，广告商直接在学校内推销他们的产品，而学生被卖给他们做观众。这也是第五章“制造被动观众”的焦点所在。将第一频道的发展置身于许多校区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之中去看，本章分析了商业用以渗透学校的各种策略，为什么学校会容忍自己成为有利可图的市场，第一频道所播新闻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它在教师和学生身上产生的效果及他们对此的反映。第一频道被视为事物的先行者，私有化和利润重建教育的“准绳”。然而，它也为那些有责任感的教师进行批判性教育实践提供了机会。

即使在我们的话语权、政策和实践中，右翼社会运动和商业的力量在持续增长，我们也不能假设他们的日程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进入我们的课堂。第六章“这到底是谁的课程”展示了商业日程如何进入课堂的另一种情况。它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在压力之下，教师和学生在做些什么。聚焦侧重计算机能力的指令性课程设置以将教育和“技术性工作的新世界”联系起来为目标，它表明了教师和学生怎样部分地受控制又怎样将整个日程变得对他们有利。这并不都是成功的，然而它确实给了我们希望。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风格。我或许该对此作一些解释。在我的前几本书中也经常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想做到在这些分析的背后有一个人，他有其独立的视角、责任感、感受力和价值观。因此，《教育与权力》（*Education and Power*）

的两版都部分地以自我批判的文章开头。在最近第二版的《意识形态和课程安排》一书的补充材料也以此为指导。我一直致力于延续和批判我先前的观点。毕竟我们不是在教会中，因此也不必担心会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我仅仅将我所从事的一些实践称为教育工作。我确切所指的是我和其他人所从事的在学校、办公楼和工厂中的政治性和教育性的工作，我们也呼吁其他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这一点很关键。这里我还是想举几个例子，可以说他们是发生在我家里的政治性和教育性的行为。

教育中对于民主的斗争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应该深切关注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高中里发生的情况。我在本书的多章中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机构中出现的问题并且与致力于号召全体教育者单独地或集体地挑战及改变这种现象的进步教师联合起来。^⑤然而，这还不够。那些在大学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应该对自己对学生或同事的所作所为负有责任。在此我所说的不仅是那些像我一样的从事教育本身的人。所有的学者，无论他们从事哪一个领域，物理、护理、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法律、医学，这个名单可以很长，他们首先都是教育者，是教师。在我们的实践中应该如何去做以贯彻我们的责任和承诺呢？这些追求民主的做法很有可能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毕竟只是处于多重矛盾冲突权力关系中的普通人。尽管有缺陷或没有完全成功，这些做法还是告诉我们，要接受这些批判性理论所需要持续施加的压力是什么。^⑥

我讲两个我自己的故事。第一个说的是我每年所讲授的关于课程发展的课程以及在艰苦的境况下与一群孩子在一起工作。（正如许多人所知，我有很实干的一面，这一点经常会推动我去做同时我也很喜爱的工作，即在地方的层面上与孩子们和其他教育者一起工作，帮助他们创造使他们的经历更具有个人和政治意义的环境。）第二个故事详尽说明了对于星期五研讨会的个人解读。我们试图在威斯康星大学构建一个集体的、宽容的环境，即使在保守主义复兴的情况下也相互支持，进行批判性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我急于表明的是，这些都是我的论述。在这两个场景下发生的事

情毫无疑问会有多重解读。我不会从任何科学的角度将它们描述成另一种实践活动威力的“证据”。它们也不是为了显示迈克尔·阿普尔是多棒的一个人。其实，我非常清楚我的这些教法 and 教学实践可能会给我带来的批评。这种意识来源于我的学生的建议、批评和支持。我想做的是，将这些故事作为我和读者产生对话的一个契机。我所做的事情当中正确与错误体现在哪里？如果你有更好的做法，你会怎样做？在与权威抗衡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实践更加有力？

作为批判性教育者，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更大互相学习的空间。我欢迎你们写信批评我、给我建议、认同对的东西或者告诉我你是如何去做的。写信给我或打电话给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展开对话。我的地址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25 N. Mills St., Madison, Wisconsin, 53706, U.S.A., 我的电话号码是：(608)2634592。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Apple@mail.soemadison.wisc.edu。

我在此书后面加上了与卡洛斯·托里斯(Carlos Torres)和雷蒙德·莫罗(Raymond Morrow)的对话作为附录。本书的逻辑顺序是以个人经历开始(保罗，我的儿子，他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在一个充满种族仇视的社会中的斗争)，然后是现代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构造，然后逐步进入到课堂实践的层面，进入到右翼对学校施加巨大压力时教师和学生的经历。以个人经历始也以个人化而终，这并不是为了取得平衡，而是因为权力和知识的问题总是归结至此。

当深思熟虑的教育家们提示我们，课程安排和教学活动总是以个人的认知为终结时，他们也无声地提示我们，无论我们批判性的研究工作是如何根基牢固，我们也必须同样具批判性地理解这个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和自身所处小环境的政治气候。最后的共识就是：作为普通的人，我们必须参与到这些关系中去。我们有义务对于那些反民主的东西说“不”并且支持那些不专横而富于包容力的事物。因此，作为此书的终结，与卡洛斯·托里斯和雷蒙德·莫罗的对话使我们回到了这样的层面：个人历史、个人传记和权力。同样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发表在此处的分析得到了体现；他们从特定的视角得到了展现。

这一点需要经得起推敲，这样你就可以看清在与它们的关联中你所在的位置。

让我们从一个大的方向入手。先说一下对于许多国家中成千上万的人们生活产生恶劣影响的保守主义的重建。

第二章

常识政治学：右翼为何占了上风

引言

对于意识形态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解基本上认为是认为：人们因为处于某种阶级层面而固守某种观念。处于统治地位的观念的力量在于：或者这种统治地位可以得到保证，或者是在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不同可以产生巨大的阶级斗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东西可以不费力气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中对人们施加影响。它只是单纯地存在于那里。常识之所以会成为常识是因为他们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这种生活状态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如果你明白了某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你就会明白他／她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信仰。你也不用深究占统治地位的信仰是如何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了。人们通常不会认为这些观念“应该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和有条件的意识形态斗争（斗争的结果应该是开放性的）来赢得他们的优势地位”^①。

然而现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度中的政治状况有理由使大家相信，这样传统的模式已不足以来理解人们常识体系中的变化。我们看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使得他们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是怎样变得广泛流传的。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信念之中存在一个裂痕，这部分人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微弱的，^②而这个裂痕又由在社会上经济和政治地位强大的群体所加

深。在常识问题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变化对于社会公众的大部分是如何看待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它在像我的儿子保罗这样成千上万的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作用了。

在这一章中，我将阐述和分析在广泛接受的观念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改变。特别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不属于精英阶层的阶级和人群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将使用理论的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产生作用的本质以及它在过去的十年间所产生的作用。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对于“伟大的理论”的重要性的某种承诺。其实，如同我在《教师和本本》及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已经在分析教育在保存和颠覆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作用上太抽象化了。^③事实上，我希望通过将理论运用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即新右翼关于我们平等观念的再构建，来揭示文化和政治举动的缺陷和存在的机遇。

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批判中强调了这一点，即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关于文化和权力的批判性文章都太过抽象。经过一个时期“密集的理论化”，又生成了一种运动，批判“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形成的理论探索中的极度抽象化和过度理论化”。如同他所提出的，在为理论而理论的追求过程中，“我们已经抛弃了具体的历史分析。”^④我们该如何不为这个潮流所左右呢？理论分析应该可以使我们“掌握、理解和解释，以创造一种更完备的知识——关于历史的世界及其进程，这样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以产生转变”^⑤。这也是我要在这里做的。

重新构建教育

概念的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说他们有自由的翅膀，可以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才可以界定它们的意义。如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给我们指出的那样，人们应该在特定的情境中寻求语言的意义。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和教育的概念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也置身于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而这个情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并且也处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之中。这些意识形态冲突也在教育的领域争夺着统治地位。教育也是那些持有不同政